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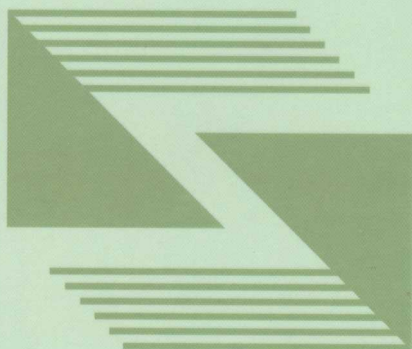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学文库
研究系列

潘晓成 ◎ 著

转型期 农业风险与 保障机制

AGRICULTURAL RISKS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现代社会学文库
研究系列

转型期农业风险与 保障机制

AGRICULTURAL RISKS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潘晓成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期农业风险与保障机制/潘晓成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2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80230 - 968 - 5

I. 转… II. 潘… III. ①农业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②农业 - 风险管理 - 研究 - 中国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9440 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转型期农业风险与保障机制

著 者 / 潘晓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林 毓

责任校对 / 明 焰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8.6

字 数 / 321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968 - 5/F · 237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潘晓成 男，汉族，生于1964年，重庆市开县人，管理学博士。1984年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奉节县县委副书记。近年来，他从事农业及农村问题研究，公开发表了《三峡库区生态移民政策绩效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分配的经济学分析》、《西部水资源开发与水利产业化模式》等50余篇理论文章，与人合著了《加入WTO与重庆经济发展研究》，参与编撰出版了《经济中介人》系列丛书。

《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制度变迁与农业私营企业成长》

《农业企业经营要素配置论》

序

几千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状况无不与社会兴衰息息相关。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的产出不仅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亦是导致社会兴废、政权更替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产品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资料（食物）这一特殊性，个人及社会对食物需求的关注是任何时候、任何人乃至任何政府都需认真面对而无法漠视的问题，在物质资料十分丰富的现代社会也不例外，个人及政府对“食物”生产的关注仍然是个人生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产生社会对“未来食物”来源的普遍担忧。

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过渡、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食物安全”这一基本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的“食物”来源问题，集中反映为中国在转型时期的“农业风险”问题而备受世人关注；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加快及社会转型的制度重建中，农业、农业生产主体及社会所面对的风险处于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其风险规避机制的建立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近几年，经济理论界对“农业风险”问题、“食物安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探寻的共同目标在于：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背景下，农业生产者规避收入风险、政府规避社会风险的模式及方法。但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仍然是不够的，本书的作者从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农业风险的变化发展规律入手，研究政府对农业风险提供保障的理论以及实践中的运用模式，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转型时期抑制

农业风险、农业风险承担主体的责任划分、农业风险分解机制以及政府对农业风险提供保障的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政府建立和完善新时期农业政策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本书沿着中国转型期农业风险分析——对农业风险提供保障的模式选择——保障模式运行的逻辑关系展开,研究的脉络清晰、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适当、实证资料充分翔实,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对“农业风险”以及“风险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①本书根据农业的系统构成将农业风险区分为生态系统风险、经济系统风险以及社会系统风险,从风险要素的构成上对农业风险的种类进行了科学的界定。近几年来,农业风险保障的概念虽然出现在许多文献中,但没有统一的定义,本书把农业风险保障界定为对农业风险损失的补偿,是对农业微观生产经营主体收益及农业对社会提供公共福利的保障,与农业风险管理概念进行了区别。以上对有关基本概念的界定给相关课题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②书中提出农业投入补偿模式是中国在转型时期,政府对农业风险提供保障的最佳模式,这一结论表明我国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工业化进程中需要首先解决好“农业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提供保障,即对农业提供收入补偿的方式既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工业化以剥夺农业为代价),也不能走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老路(对农业提供高代价的保护),而应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适应于农业可持续发展;③本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在完全市场化环境中,农业的弱质性带来生产经营者收入风险”、“政府对农业的补偿属公共品购买行为”等观点,对我国在转型时期规避农业风险,增加政府对农业投入提供了特殊的理论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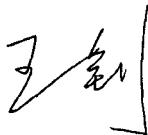
当前,在全国各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小康建设吹响号角的重要时期,“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及“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将成为“十一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但是,伟大的新农村建设实践需要解决和处理好过去在社会、经济不平衡发展中所带来的诸多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其中包括探寻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规避农业风险，实施以工补农和以城带乡的正确途径，在“补”和“带”中，如何实现协调发展的目标，既要提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政策效率，又不能因为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损失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效率，两者之间需要协调促进。近几年，各地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对党中央的战略思想理解不够、理解不深的问题，总是存在着“城市应不应该带动农村？”、“工业有无能力补偿农业？”等方面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在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对工业补偿农业还存在一些片面的做法，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形式化和表面化的成分。本书作者在研究中提出的投入补偿方式，主要观点集中于对农村加强基础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进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对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业补偿方式选择和实现途径进行了有益探讨，对解决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工作在基层，长期战斗在农业工作第一线，对农民群众有很深的感情，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较为深刻。作为他的导师，我十分赞赏他的刻苦和钻研精神，并对他的研究工作能取得初步成果深感欣慰。

希望本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转型时期“三农”问题的研究，对各地深入贯彻党中央新时期农业政策，进而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做出贡献！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2007年11月18日于重庆

前 言

农业风险是客观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①对生产经营者而言，生产、加工以及经营过程的各环节会遇到来自于自然、社会以及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使生产经营者的收益不确定；②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经济体系中，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度，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农业的效率低，对社会提供产品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造成对社会食物供给（食物安全）的波动。由于农业是高风险产业，人类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探寻规避和防患各类风险的措施，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确保生产经营者利益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风险保障体系。本书对农业风险保障模式的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特殊的转型时期应对农业风险，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保障的政策途径。

本书选择“农业风险”与“保障模式”这两个相关问题作为研究的大方向，主要基于以下认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因应农业风险变化发展趋势，选择适宜的保障模式，无论对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还是对政府制定和调整农业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①国家工业化应解决好“农业问题”。英国工业化时期，李嘉图提出了经济进程中的粮食风险。他认为粮食的价格波动会提高工业化成本，降低工业效率，指出“通过粮食自由贸易化解粮食风险”。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首先化解“农业风险”，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2003）提出了解决工业化中“粮食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通过增加农业投入，推进技术革新，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当前,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风险及保障的研究是不够的,农业风险研究往往局限于从效用理论视角分析农业微观经营主体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具体行为;而对农业风险带来的社会问题——“粮食安全”的研究,囿于计划经济思维惯性影响,不知不觉地维护了粮食管理部门和经营者的利益,而忽视了生产者利益。以上两方面从理论上割裂了保护微观生产经营者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我国工业化中如何解决好“农业问题”在理论上出现误区;②当前,在我国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中,中央把增加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条件,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工业能不能支持农业”、“城市该不该支持农村”的争论。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对农业和农村重视不够,从而使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出现偏差。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特定背景下,本书对中国转型期农业风险及保障模式这一课题的研究,旨在从理论层面探索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农业发展规律,从实践层面探讨中国转型期应对农业风险的具体保障模式及相应的政策手段。

本书基于农业风险分析→农业风险保障模式选择→农业风险保障模式运行的逻辑关系展开,通过对中国从计划体制下农业向市场体制过渡中风险变动趋势分析,国内外因应农业风险提供保障措施的不同形式、变迁以及绩效分析,对不同保障模式进行比较选择、影响因素分析,按照选择结果进行制度创新的思路构建分析框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部分:

(1) 借鉴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借鉴农业发展经济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农业产业特性理论、政府行为理论等对农业风险和风险保障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在理论分析框架内对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以政府介入为切入点,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研究政府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的模式和途径。本书提出的农业风险保障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保障;二是对全社会成员享有食物安全

福利的保障。农业风险保障从微观层面讲,是在一定的制度模式下,政府通过投资、补贴等多种方式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补偿,稳定农业生产经营者投资收益的措施。宏观上主要通过建构个人、社会和政府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满足社会安全和进步需要的途径。

(2) 借鉴国外农业政策的发展变化状况,研究国外农业风险保障的演变过程和变动趋势。农业风险保障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通过对部分先进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剖析,探讨农业风险保障中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为中国转型期风险保障模式选择提供借鉴。

(3) 农业风险与风险保障作为矛盾的对立面,两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互为依存,在矛盾的运动中变化发展。本部分借助近年全国、部分地区相关统计资料和调查材料,通过实证研究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中农业风险发生、变动状况,以及对风险保障形式和保障水平进行考察和分析,探寻影响农业风险保障绩效的内外部因素,从总体上把握农业风险的发展趋势以及风险保障水平,对中国转型期选择农业风险保障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铺垫,并对模式选择提供实证依据。

(4) 从经济效应、保障目标及约束条件等方面对风险保障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选择适宜于中国转型期国情的最佳保障模式。在此基础上按照所选择模式构建风险保障体系,探讨运行机制,探索制度创新。

本书对农业风险的分析以及对保障模式的选择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一特殊的大背景,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经济制度、运行机制、组织模式、增长方式等多重变迁、渐进的发展过程。农业在这一变迁中的核心是实现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发展。本书在借鉴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涉及研究对象的有关概念,按照规范、科学的标准,从研究的实际要求出发,对涉及到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必要诠释,模糊不清之处给予了重新界定。对农业风险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复

杂、涉及到多学科理论的系统工程，现有的许多文献对有关概念的界定多从所研究的具体要求出发，从某一个侧面给予描述，缺乏认同感。①在保险学对风险分析的相关理论中，风险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收益）三要素构成，本书对农业风险界定为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包含了农业风险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后果。对风险的衡量采取统计学的概率体现了风险研究中的事前标准，而非用风险损失的事后标准。风险作为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其结果既引起风险损失，也可能带来风险收益。②采取系统论观点对农业风险进行分类。以前的研究对农业风险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本书根据农业的系统构成将风险区别为生态系统风险、经济系统风险和社会系统风险，在构成风险的三要素中，三类风险的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及风险后果各不相同，具有“质”的区别；③农业风险保障出现在许多文献中，但没有统一的定义，本书对农业风险保障界定为对农业风险损失的补偿，是对农业微观生产经营主体收益及农业对社会提供公共福利的保障，有别于风险管理概念。

本书对农业风险及保障模式的研究紧扣农业转型这一特点，立足于用市场经济理论及观点分析问题，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多种风险因素综合作用使转型时期农业风险呈扩大和复杂化趋势。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体制过渡中，农业的组织结构和形式、生产经营环境、生产经营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生产经营者需面对更加复杂而多变的风险环境，自然灾害、市场波动以及多种因素造成农业经营者收益受损，同时也影响到全社会成员的总体福利水平。农业在转型时期，风险也在发生变化，通过对近年全国和部分地区农业统计资料的对比分析、产量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产量波动与价格波动的相关分析、农产品社会需求变动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风险呈扩大趋势。农业产量波动、价格波动并非单一风险因素影响的结果，农业生态系统风险带来农产品产量的波动是导致农业社会系统风险的主要原因；农业生态系

统风险与经济系统风险呈弱相关关系；农业经济系统风险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间接地带来社会风险。

农业在转型过程中，风险变化呈现复杂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农业作为由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五大要素组成的具有开放性和不稳定性的多层次复合系统，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和制约农业的发展。生态系统中，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受到来自于自然环境状况变异产生生态风险；经济系统中，农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差异，生产的季节性带来了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使生产经营者面临经济风险；社会系统中，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对风险的厌恶造成农业资源流失，产生资源风险，最终带来农产品供给中“食品安全”问题。

农业产量波动、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农产品供给安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农业转型期风险的主要形式。农业在转型时期风险呈复杂化趋势，要求我们在制定防患风险、提供保障措施的政策目标应具有多重性：一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二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收入的目标；三是维持资源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四是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目标。

二是现阶段我国农业风险保障能力弱，农业政策绩效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或生产者因应农业风险采取了不同的风险防控形式，然而不同时期对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收益和福利保障差异很大，传统农业时期，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低，生产者收入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期，政府对农业通过高补贴保护了生产者利益，却带来“扭曲市场”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本书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绩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业提供的风险保障弱，农业政策执行中效率低。导致这一结果的内部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政府及社会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的动力不足；同时，制度供给不足、经济不平衡发展亦是风险保障绩效低下的主要外部原因。

三是投入补偿保障是中国转型时期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的最佳模式。在传统农业时期,对土地的占有关系决定农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具有强制性,土地占有者对“小农”的剥夺使生产者破产并最终沦为需要社会救助的对象,同时,农业自然风险加剧了小农破产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社会向农业提供风险保障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对灾民、饥民的救助;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主要向工业提供剩余,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这一时期,农业风险救助作为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在方式和手段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工业化成熟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市场、扭曲价格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提供收益补偿,并以农业收益补偿为主线,构建农业保护体系;工业化后期,随着世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农业风险保障从扭曲市场的收益补偿模式逐渐向投入补偿保障模式演变。选择中国转型时期农业风险保障模式,既不能沿袭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模式(救助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收益补偿模式),而应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适宜的模式。通过对比分析农业救助、收益补偿及投入补偿三种模式可知,在中国转型时期,投入补偿模式效率最高,有利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最佳的风险保障模式。在中国转型发展中,农业风险保障的具体方式向投入补偿过渡表现为渐进演进过程。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生产经营者参与的多主体形式,形成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协调机制。

四是转型期农业风险保障应按投入补偿模式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本书对农业风险保障投入补偿模式的内涵进行了具体界定:①投入补偿模式是政府的农业政策从扭曲市场的保护政策向减少对市场干预的支持政策的调整结果,投入补偿模式下的农业政策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②投入补偿模式通过弥补农业产业缺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率,加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对农业风险保障的具体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环境条件改善以及对农业

基础设施增加投入等方式,强化农业的抗风险能力;③投入补偿模式需要在生产者、经营者与政府之间、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形成新的利益机制,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表现为农业高风险条件下,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利益的保障。以上观点对中国转型时期提高政府农业政策绩效、创新制度、增加农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中国在转型期构建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应按照投入补偿模式的要求,完善运行机制,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机制、农业的区域补偿机制、农业的生态补偿机制,形成完整的、有效率的政策体系。

五是政府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购买行为。①农业风险是农业产业特性和不确定的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农业生产对环境条件的高度依赖性、生产和销售的季节性、产品需求缺乏弹性决定了农业比其他产业具有更高的收益风险。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农业投资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胡靖(2001)、黄祖辉(2004)等学者认为农业存在先天的产业缺陷:对于非农产业而言,收益 π 与资本 K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的函数为 $\pi=f(K)$,而农业的收益函数为 $\pi=d+f(K)$, $d<0$ 。 d 即为农业特殊的产业缺陷,意味着农业在获得与其他产业相同的收益之前需要克服产业缺陷的影响。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使农业生产者需支付更高的产业成本和生产成本,同时面临机会成本损益,这也是导致农业投资高风险的内部原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总是向风险低、利润率高的产业部门集聚,农业产业弱质、经济体系不平衡发展不但造成农业微观生产经营主体的收益损失,也由于农业资源的流失造成农产品供给不足,降低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②农产品兼具“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特性,微观生产经营主体对其生产和经营的农产品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有充分的独占性,这一层面上的农业是私人物品的生产;另一层面上,农业在对市场提供产品的同时,全社会成员还需要获得对农产品消费预期的“安全感”,这种对“食物安全”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农业微观生产经营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和“利润最优”原则而非“社会需求”和“食物安全”

原则确定生产或经营方向。“食物安全”作为公共产品只能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生产，由社会支付由此产生的成本。对此，政府在不能直接组织“食物安全”这一特殊公共品生产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向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购买）的方式来实现，以上分析也表明了向农业微观生产经营主体提供风险保障与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具有同一性。从这一观点出发，政府向农业提供风险保障表现为对公共安全的购买行为，政府增加对农业投资体现了对公共安全购买的价格支出，而并非对农民群体的怜悯和厚爱。这一结论为当前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③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应实行政府主导、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作用，市场机制本身具备调节农业风险的机能，在构建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中，微观生产经营主体应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决策能力。政府对农业提供风险保障在于弥补农业的产业缺陷，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对农业生产经营者风险损失进行间接补偿，而非直接干预市场的作用。

本书的研究工作从选题开始到完成，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钊教授给予了倾力指导，付出了辛劳和心血，没有他的耐心指点和严格要求，作者不会完成研究工作和本书的创作，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积极向上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同时，在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得到了西南大学戴思锐教授、王锡桐教授、谢家智教授、重庆大学冉光和教授的指导；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彭珏教授、李容教授多次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本书的完成是在大量参考和借鉴学界前辈和同仁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亦得到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昕博士、重庆三峡学院祁俊生教授的帮助；重庆市农办政策法规处陈守仲老师、重庆市奉节县政策研究室、统计局的同仁们为论文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我的老领导，原中共奉节县委刘本荣书记，是他的鼓励让我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本书的创作；感谢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向益平、李品雄、黄定坤、潘万山、刘木平、黄宇新、李立宪、曾利等人从工作和生活给予我

无微不至的关照；感谢奉节县委办公室的全体同志。

本人出生在大巴山区，这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多年以来，我在这里生活与工作，对贫穷的农村状况和农民的疾苦有较为直接和真实的了解，一直以来，我在思考和实践着让农民“安居乐业”的梦想。正是这片土地、这一群人给了我学习与研究的动力，我愿将此书献给他们：我最可亲、可敬，勤劳、勇敢而质朴的乡亲们！

本课题的研究立足于总体上从实证出发，客观地反映中国转型期农业风险的变化情况，但囿于数据资料和参考文献有限，研究工作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存在固有的价值判断，研究结论不免有失偏颇。加之对中国转型期农业风险这一问题的探索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有从不同视角和专业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由于以上诸多原因，本书肯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潘晓成

2006年3月于三峡